

省委党校系统第二届哲学年会

# 论文选集

旅顺口区委党校  
大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省委党校党校工作处  
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

## 说 明

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七日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召开。有一百四十人参加，收到论文七十八篇，教学经验总结十七篇。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同志，省哲学学会顾问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继良同志、吉林大学教授高清海同志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

会议就哲学与改革以及教学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收到的论文之多，发言之勇跃，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经验之丰富，都超过了往年，使与会者收获很大。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确定一九八八年第三届年会在朝阳市凌源县委党校召开，主题是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会议还增补了阜新市委党校校长姚志民同志，省政府机关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政府讲师团团长王任同志为研究会副理事长，增补旅顺口区委党校副校长关永德同志，昌图县委党校副校长董乃武同志为理事。

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  
一九八六年十年

# 目 录

辽宁省委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

第二届年会开幕词	李 哲	(1)
哲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韩英树	(5)
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		
——从姓“社”还是姓“资”谈起	刘继良	(22)
关于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几个问题	张凤坡	(30)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哲学思考	蔡金贵	(39)
“一国两制”的哲学思考	林 志	(46)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宋 刚	(59)
对“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	王福成	(64)
正确对待新形势下的党内矛盾	姜士贤	(70)
官僚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	杨钟颖	(78)
理想教育方法科学化初探	王文舒	(84)
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初探	郭文翰	(91)
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贯彻干部		
“四化”方针	雷明伟 徐晓平	(97)
社会发展中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		
相互关系	侯述佳	(105)
改革与人的现代化	张桂华 于文军	(111)
试谈领导干部观念现代化	田承坤	(117)
变革传统观念 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刘长黎	(122)
略述现代思维发展的特点	闵嗣井	(130)

多维型思维与发展	张福坤	(134)
<u>试论思维方式与思想路线的关系</u>	赵洁岑	(138)
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地理因素初探	王永昌	(146)
试探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的中介	左颖哲	(153)
试论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生活方式	王景荣	(162)
生产力是能力和力量的对立统一	夏玉兰	(165)
要全面地理解实际的内涵	佟志武	(168)
《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评述	孟金山	(173)
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黎玉学	(187)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要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西丰县委党校教研室	(193)
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调查研究的教学 ——浅谈调查研究与方法论和认识论		
.....旅顺区委党校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	(204)	
面向实际，搞好哲学课教学	昌图县委党校	(210)
谈能力教学的障碍及解决办法	刘培庚	(217)
对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内容改革的几点体会	李贵相	(226)
课堂讨论是党校教学的重要形式	王崇焕	(234)
哲学课“案例教学”的尝试	张德民	(244)
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 理事、常务理事名单		(249)

# 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

## 第二届年会开幕词

李 哲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旅顺口区委党校、大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和党校工作处的积极筹备下，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大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特别是旅顺口区委党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了接待这次会议，旅顺口区委党校从校领导到全体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暑假休息时间，多次召开校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很大支援和赞助。在此，让我代表辽宁省党校系统哲学教学研究会和与会的全体代表，向大连市委党校，旅顺口区委党校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届年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探讨在新形势下，哲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研究和探讨哲学教学如何反映时代精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为改革服务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安排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请有关专家、学者作哲学与改革的学术报告，请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http://www.ertongbo.com)

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作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以便我们了解实际，开阔视野，掌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信息。

第二，交流省、市、县（区）党校哲学教学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哲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便使我们的哲学教学更加适应党校正规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新时期培训各级领导干部的需要。

第三，围绕党校哲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建设，围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进行理论探讨，以便把研究和探讨的新成果纳入教学中去，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

同志们！为什么要在哲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呢？首先，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当前世界上有两股潮流，一是发展的潮流，也就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二是改革的潮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当然改革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两股巨大的潮流汇集到一起，使当代实践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改革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就不能不听从实践的召唤，反映时代精神，总结和概括新技术革命和改革潮流中的新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我们党校的哲学教学和研究，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就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反映当代实践的脉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改革。这是时代的发展向党校哲学教学工作者提出的迫切任务和要求。

其次，是新时期干部队伍结构的变化，向干部培训工作

提出的要求。

当前，党校正规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解决干部学历问题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就全省说的，各地区的情况不尽一样）党校今后既要办长期班又要办短期班，进入长短结合的时期（无长不稳无短不活）。这个时期的长班和过去的长班也不同，过去是以解决学历为主，现在的长班不是解决学历，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战略培训。这就是说，当前干部队伍结构已发生变化，他们年轻，文化水平高，许多人都是大专毕业，再到党校学习，让他们学什么？我们怎么教？这是干部队伍结构变化，向我们哲学教学提出的新课题。如果再从物质第一性讲起，系统讲授哲学原理，显然是不需要的。怎么办？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做些改革。近年来，许多党校在这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希望在这次会上进行研讨和交流。

同时，我们这次会议上，还将围绕着改革中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当前我国的社会改革正在逐步向纵深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互相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最近在报刊上同志们已经看到，中央党校召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讨论会。我们省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将于八月中旬在兴城召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我们这次会议也准备把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点讨论的理论问题。希望同志们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和方针、旧体制的弊端等问题充分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一定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勇于思考、勇于探索，为学术研究和探索真理创造一个和谐、融洽、宽松的环境。

我们有个想法，在这里向同志们说一说，我们这次研讨会是在暑假期间召开的，平日大家忙于上课，抽不出时间开会。因此，只好在暑假时召开。因为是在假期开会，所以，这次会议也准备采取去年兴城会议的做法，半天学习讨论、半天休息，或参观学习。不想安排的太满。

最后，希望我们与会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 哲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韩树英同志在辽宁省党校系统  
哲学教学研讨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

林志同志早就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我说，如果我这时在大连，一定要到会和大家见见面，听听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好经验。林志同志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政治体制改革。我事先没有准备，也没带上什么材料，只好和大家一块研究。

小平同志最近讲了两项政治体制改革，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和保证。他讲了些例子，如精简机构，边简边增，现在的机构比过去都多。还有党风问题，这实际是法律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他提出用一年的时间来讨论，看准了，想好了，再动手。十三大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以后开了几次讨论会。中央党校也开了讨论会，朱厚泽同志到会。这主要是理论部研究生前年接受国家体改委的委托，对县以下的政治体制做了些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讨论，在上个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会。这是影响较大的第三次会议，报纸作了介绍。在我们学校举行结业典礼大会时，胡启立、王兆国同志到会。王兆国同志受胡耀邦、胡启立同志委托做了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启立同志讲，小平同志跟我们讲了，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要慎重，不要一阵风，报道要掌握分寸，不多报道，在研究时大家要放开思想，各种意见都可以谈，但报道要慎重，国外对这个问题反应很灵敏。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要下苦功夫。

**下面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哲学与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从来都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一个认识论的讨论。我们的哲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上打开一个突破口。那些年，我们的哲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我国这些年来有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都是由哲学观念的变化引导出来的。正如恩格斯讲的，德国同英法一样，也是哲学变革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我们已经通过哲学变革把我们国家引导到体制改革这一大步，哲学今后能不能起作用呢？起什么作用呢？我想，这是在座的同志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有这么一个观点，重大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体制问题、重大的经济理论的最后解决战斗需要哲学观念。也可能我们搞哲学的同志不参加，但他们要解决问题还需要有哲学观念。问题是自觉或不自觉。

哲学理论应该联系实际，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当前我们国家的实际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的哲学要为改革服务。改革需要哲学理论的指导，需要哲学论证改革的必要性，需要从哲学的基础提出改革的任务，需要从哲学的观点来指导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因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小平同志讲，改革是第

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在我们中国一定能发挥出它的优越性。但是由于我们体制的不完善、不完备，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就难以前进，社会主义就难以完成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

前年我到日本，遇到西园寺宫一的儿子西园一广。他是1957年到的中国。在北大经济系毕业，1967年离开中国回国。他说，他刚到中国时，日本的水平和中国在表面看来差不多，在六七年后回来再一看，变化就大了。日本经过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达到了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的经济一直是“加法”，而我们却来了两次大“减法”，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这两次大折腾，我们现在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这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学哲学的，都知道恩格斯讲过，在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呢？1979年我到西德去，西德人说，我们同东德起点是一个，现在看看怎样？国民收入是他们的两倍。当然这里原因是复杂的，需要具体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前是欧洲先进的工业国，和法国差不多，现在东欧里属第二位。东德现在人均工资每月五百美元。虽然它在东欧国家里是好的，但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缓慢的。阿尔巴尼亚这个欧洲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还有一百多美元，而我们是一百多人民币。苏联是第二经济大国了，但现在有个危险，同美国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后边还有个日本紧追。它搞不好就很可能落在日本后边。所以，戈尔巴乔夫那么着急。去年九月，日本召开了一个九百多人的理论讨论会，超党派的。他们讲社会主义

形象低落，搞社会主义的人不好办。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怎样，需要研究。苏联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了起来。这说明体制需要重大改革。小平同志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经济体制改革的哲学论证，我看现在做得还不够。为什么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我看更深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我现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它既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又是辩证法问题。过去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消灭阶级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它应该有自己的内在动力，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形式来发挥它的客观的内在的动力作用。为什么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为什么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同个人利益挂起钩来，为什么要坚决打破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这都是哲学思想问题。我们很长时间是唯心主义观点，否认物质利益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1958年开始批资产阶级法权时讲，爬雪山过草地，谁讲物质利益了？谁讲按劳分配了？那是革命，那是手段。还不是大家追求的一种目的，要经过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当家做主，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包括自己的工资、自己收入的再分配。我们要反对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即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靠精神动力。老人家讲，我们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阶级还革命，这是没有阶级分析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一直批到文化大革命，调子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是什么？它还是谋生的手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我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历史唯心主义时，我们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庸俗社会学，这就是只承认物质利益的作用，不承认精神的作用。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又承认精神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靠只讲奖金、工资等来工作，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物质利益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再一个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差异，承认不承认矛盾，承认不承认企业间有差异，作为集体经营的劳动成果，企业之间有没有差异，承认不承认这个差异？这个差异，这个矛盾它起什么作用？承认不承认职工之间存在差异，存在着矛盾？这个差异和矛盾起什么作用？这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吃大锅饭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上学不承认差异，不承认矛盾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这些，那么，将采取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从哲学上讲，这种内容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发挥它的作用？这种动力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或经济体制来运行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国家采取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里有许多哲学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特点问题，怎样有计划地发展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我想，在搞经济体制改革时，还应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论证，旧的哲学观念摒弃和新的观念的确定。这个问题搞深搞透了，方向就能正确，遇到新的问题时，思考的路子就能对头。但这不是说只有哲学就行了，其它科学就不学了。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但哲学应该起它应起的、别

的学科不能代替的作用。这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兴奋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哲学论证、哲学探讨还远没有完成，不能把它丢了。

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哲学界参与，这当然是要了。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它就要出毛病。所以，我们大家应积极影响政治体制改革，从我们的哲学教学、哲学研究、哲学宣传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中央下半年要开全会，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哲学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更直接了。所以，我们在教学、研究上要做准备。

总之，我们的哲学教学，哲学研究要全面地为改革服务。在改革中，起到哲学工作者应该起到的作用。现在哲学起的作用不理想，还停留在讨论旧的原理、概念、范畴里。原理、概念、范畴也需要研究，但这应和实际结合起来，增添新的内容。

耀邦同志在关于理论工作的讲话中提出，干部要学四门课，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近代史、国际政治经济、世界工人运动史。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选编已告一段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分哲学、政经、科社三部分，哲学选了二十八、九万字，初稿已印了出来。这是供一定的高级领导干部用的。对这个工作我们要有所准备。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要全面为改革服务。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作为方法，也需研究。现在又开始了“新三论”，你们把它研究一下。“老三论”现在应用比较广泛，实际工作者已经开始应用了。如果我们

抱着五十年代的观点，对此不沾边，那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了。但它作为方法，我们应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它的适用的范围、限度，要讲清楚。现在不是有人在讲，要用“三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恐怕不行吧？它不能代替辩证法，辩证法是更高的层次。第一，可以说它证实了辩证法的科学性。第二，它为丰富和发展辩证法提供了科学的材料。恐怕是这么一个关系。系统这个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是有的。我们讲普遍联系，这不是更高更深更基本的系统。而且系统论光讲要素，要素有没有矛盾，系统本身靠什么来推动发展？一个旧系统怎样过渡到新系统？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分别问题。大家再回顾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开始就批判因素论，就是把社会分成各种各样的今天所说的因素，这些因素机械地相加起作用。这种思想很广泛，在中国是胡适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讲“一个观念可以引起一场战争”等等，不仅仅是经济对历史起决定作用，教育、政治等都起作用，没有什么基本的东西和不基本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同样地起作用。如果系统论都是这种历史观念在支配，没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起很大作用。控制论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讲的是“负反馈”，保持系统的稳定性。但总是调整，这个系统能永远保持下去吗？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讲，事物有它的产生就有它的灭亡。《第三次浪潮》中提到一个美籍日本人，叫简山，这个字翻译错了，我们查了下，应叫丸山孙造。他提“正反馈”。“正反馈”是在破坏系统的稳定性。有“负”必然有“正”，有保持稳定的，必然有要否定这个稳定的。所以，只讲“负反馈”保持稳定性，不是辩证法完整的

东西了。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是更高的层次。但应具体化。“老三论”东德开始叫它“横断科学”，这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就是步步分化，又步步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出现一些边缘科学作为科学的分化的内在的统一的表现，再一个是，“老三论”是科学本身提出的方法论出现的。“老三论”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搞起来的，是科学发展的本身使它接近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我们说，第一，它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正确性。第二，它提供了丰富和发展辩证法的材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用各种科学的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和“三论”的关系，“三论”的性质，适用范围要搞得准确一点。这样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

## **第二个问题想讲一讲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 中央领导同志讲得很深很准了。我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下。

第一，这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本身的需要。这是解决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矛盾的需要。我们国家许多年以来，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矛盾，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也都暴露出政治体制方面是有严重缺欠和弊端的。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和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完善我们政治体制的意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可以做一些回顾。如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废除干部终身制问

题，等等，已经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这本身是不是就够了呢？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这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而提出来的，要解决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变化之间的矛盾。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现在的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从生产型转为生产经营性。原来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些环节和若干方面，不能适应这个转变。刚才我们说了，精简机构，只从机构本身考虑是不行的，那样老也减不下，减完以后又增加了一部分，办事效率也提高不了。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的条块分割就不适应了。所以，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用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同发扬民主联系起来。

第三，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就是解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胡启立同志在上海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要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来发展文艺。这个意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过的。在纪念“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的会上，都宣传这个方针。在一些理论讨论会上，大家提出，要保证“双百”方针的实现就要有立法，立法就是个政治上的问题。苏联原来的经济体制是不活跃的，政治体制也是压抑人的，思想也不活跃。有个同志从苏联回来说，在苏联，普通人也是不敢说话，干部子弟可以乱说一通。社会主义这样不行啊！这样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也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它的活力。

所以，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几个方面的需要。当前中央非